

細說陳獨秀 (三)

費雲文

創辦嚮導月刊雜誌

中共總部成立後，陳獨秀完成廣州支部的組織工作，回到上海，與第三國際派來的代表馬林會談，同意接受其財務支援，並遵循第三國際的政策展開積極活動。

於是，除繼續在各地發展組織外，並於民國十一年創刊「嚮導月刊」，陳獨秀任主編，嚮導月刊為中共的機關報。

民國十一年八月，馬林在杭州西湖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當中，提出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鑽到國民黨內寄生、壯大，進而分化、顛覆的辦法，首先卻遭到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反對。認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會沖淡了共產黨的階級性，損害了共產黨的獨立性。」經過馬林以「利用國民黨名義，才能吸收到羣衆，拉攏國民黨左派，可以造成國民黨的分裂」為由，加以勸說，並且以「服從共產國際的權威」責成原則。

當時，中共中央已接受共產國際每月美金一萬二千元的經費，陳獨秀也就不再堅持，而表示

「有條件」的服從了。

「西湖會議」後五天，陳獨秀、李大釗、馬林前往拜訪國父。國父贊成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以促成國共合作。後幾天，陳獨秀由張繼介紹，正式參加國民黨為黨員。

國共第一次合作，在馬林的撮合之下，蘇俄外交官越飛赴上海與國父相見，經過長期會談，於民國十二年一月廿六日發表「孫越宣言」，闡明：「蘇俄對國民黨的援助，是為達成民國統一與國家獨立；共產主義不能在中國實行，蘇俄先期宣佈的放棄對華一切特權，仍然有效。」

五月，馬林從莫斯科返回上海，攜有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特別訓令，要求中共立即擴大與國民黨的合作，並提議中共從速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特別訓令要點為：

- (一) 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當前的中心任務。
- (二) 中國國民黨是領導國民革命的重心。中共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以期實現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

(三) 中共在這一國民革命中，仍應保有組織的獨立和政治批評的自由。

(四) 職工運動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中共應積極促進其發展。

馬林並對此一訓令的基本精神加以解釋：在一切以完成國民革命為中心任務的前提下：

(一) 所有中共黨員均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二) 所謂組織獨立與政治批評自由，不可過於強調，以免有損國共合作。

(三) 職工運動也是國民革命的一部份，中共黨員應該吸引大量工人參加國民黨，俾能接受國民革命的領導。中共至多祇能在工人中進行一些階級教育。

馬林此一解釋，引起張國燾的激烈反對，他反對「一切工作歸國民黨」，而認為「中共除國民革命外，還有階級鬥爭」，主張「不必全體黨員都加入國民黨，即使在國民黨內工作者，也不可隨聲附和，喪失共產黨原來面目。職工運動，是中共所領導的獨立運動，不能領導其成為國民黨的職工運動。」

於是，陳獨秀從中加以協調，要求雙方互相讓步，最後終在大會中通過他的提議：

「全體黨員均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但一部份中共黨員可不在此限內擔任實際工作，尤其是要中共各級領導工作同志，不應兼任國民黨的職務，以免混淆中共的獨立面目，同時，爲了加強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影響起見，中共應幫助國民黨增加工農黨員，發展其工農羣衆中的組織。」

結果，大會宣言中，祇表示「承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並希望社會上的革命份子都集中到國民黨來」，而刪去馬林原擬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各項革命工作都是國民黨工作的一部份」等語句。

在此之先，陳獨秀曾發表文章，以爲：「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路線，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等到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後，無產階級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經過此次共產國際的訓令和馬林的解釋，陳獨秀當時也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並且認爲共產黨不可別樹一幟。他說：「若是大家都想別樹一幟，這便是遊戲、出風頭，不是真正革命。」可是，事實的發展，卻不是他所能控制。

承受共黨失敗責任

民國十三年一月廿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的人數日

漸增多，並且取得若干重要職位，於是「滬海月刊」出版書刊，宣傳馬克思主義，派人滲透到國民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共產份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論和階級鬥爭思想來曲解三民主義，更從組織活動中，極盡分化、離間的能事，製造其所謂「左派」、「右派」、「中派」等名稱，高唱其「革命向左轉」口號，在「中共第四次大會」時，即有「要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決議。

自國父北上逝世後，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翻雲覆雨、跋扈險險的操縱運用下，愈演愈烈。終有民國十五年三月廿四日「中山艦事件」的發生。當時，中山艦長李之龍是共黨，受人指使，想乘國民政府正準備北伐的黃埔軍學校校長兼廣州衛戍司令蔣中正搭乘該艦由廣州返回黃埔時，強迫他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幸被蔣校長事先發覺，立即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份子，收回中山艦，搜繳共黨份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槍械，監視各俄國顧問的行動。十四日，國民政府解除了俄國顧問十餘人的聘約；廿四日，軍事顧問季山嘉等人離華返俄。

事變結束後，鮑羅廷匆匆自俄國趕回廣州，根據史達林的意圖，採取退讓態度。陳獨秀也認爲「蔣介石不但有武裝力量，而且整個資產階級都在他那一方面。爲了求得資產階級留在統一戰線內，對蔣的進攻，只能採取退讓政策。」並且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說：「倒蔣必反蔣，應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爲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廿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行動，如此

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

「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團體，你就應該起來打倒他，爲世界革命丟掉一個反革命團體；如果是共產黨同志中那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絲毫不用客氣。」

民國十五年五月，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會議，通過「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中的人數，不得超過委員的三分之一，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並要求共產黨交出加入國民黨的全體黨員名單等。陳獨秀也在「嚮導」刊物上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表示：「這是國民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他還認爲：「這樣可以避免我黨包辦國民黨的嫌疑，有利於兩黨團結。」

北伐進軍後，進展神速，一方面克服武漢，一方面克南昌、南京、上海。當民國十五年十二月鮑羅廷偕同部份國民政府要人抵達武漢後，即開始在史達林的授意下，發動「倒蔣運動」，竊奪黨權，成立「政府」，放任共黨份子，在兩湖進行清算鬭爭，搞「現金集中」、「糧食集中」，秩序大亂，社會騷亂。

但攻克南京、上海的國民革命軍，卻在蔣總司令領導之下，平息了共黨份子在南京殘害外人，引起交涉之事，並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收繳共黨組織的煽亂上海的「工人糾察隊」槍械，安定上海。四月十八日定都南京。

就在此時，汪精衛在共產國際的力促之下，

由法國回到上海，承諾盡力調和國共兩黨關係，約定四月十五日在南京開會，然後前往武漢；不料汪精衛卻於四月五日逕自潛往武漢，臨行並與陳獨秀發表共同宣言，公然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制壓反革命」，並且把國父的「聯俄容共」政策的「容共」說成「聯共」。陳獨秀也和汪精衛一同前往武漢。

武漢方面，不久即因共黨份子實在鬧得太猖狂了，激起了軍人的憤慨；自五月廿一日，何鍵部的許克祥團在長沙展開反共行動起，到五月廿九日，唐生智也通電反共了。形勢當然對中共非常不利。

正當此時，共產國際卻在史達林的授意下，來電給鮑羅廷和羅易，希望他們能促成：

實行土地革命，沒收土地；由二萬武裝共產黨員及五萬農份子組成新軍隊，消滅舊的軍隊；在國民黨中央要員中，增加農工領袖，代替舊領袖；組成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派」。

當六月五日羅易將此電送交汪精衛看過後，汪才有了覺醒。武漢反共的趨向也逐漸明朗了。

爲了挽救武漢「分共」的危機，莫斯科來電明白表示，中共還應採退讓政策，明白表示尊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必要時中共黨員可以退出政府，過去若干作風可以更改，但不可以退出國民黨。

六月廿日，在陳獨秀主持的中央擴大會議上，制定了「國共合作十一條」，指出「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領導地位，共產黨人參加政府，並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爲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

用請假的名義退出政府」。甚至還提出：「工農等民衆團體，均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革命武裝，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

但這些讓步，並沒有能挽回什麼。等到七月十五日武漢開始「分共」，陳獨秀就躲起來了，向「中共中央」表示無法繼續工作。

「中共中央」迂迴回到上海，於八月七日舉行緊急會議，在史達林的代表紐曼(Neumann)的指使下，發表了先由共產國際準備好的「告全體黨員書」，把中共失敗的責任，推到陳獨秀、譚平山、張國燾身上，指斥他們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免去陳獨秀書記長的職位。

這對他來說，未免有點「冤枉」，因爲他的主張、文章，大都是以第三國際的馬首是瞻；尤其到武漢後，在鮑羅廷、羅易他們的控制之下，根本不能作出相反的論調和作法。

正因爲如此，在中共的「我黨的機會主義史」上，把陳獨秀和鮑羅廷混合起來，加以批判過失，有以下六項：

(一) 迴避帝國主義，離開東南工業中心，接出馮玉祥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但馮打到河南，卻與南京合作，不與武漢合作)

(二) 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後再說。

(三) 取消所謂工農運動的過火。

(四) 向小資產階級讓步。

(五) 承認國民黨的領導權，共產黨在政治上完全處於隸屬地位。

(六) 完全向汪精衛、唐生智投降。自動的承認退出國民黨和其政府，以換得共同打到南京去。

中國托派統一領袖

陳獨秀離開武漢到上海後，未再他去；但仍從事理論研究和著述，對當前情勢，他的看法是：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等到將來再行舉行『社會民主革命』。在當前不應去觸動蔣介石的『反革命國家機器』，而只能進行所謂『國民會議』爲中心口號的合法鬥爭。」

因此，他反對中共黨的各種「革命活動」，特別是「武裝鬥爭」，甚至說：

「紅軍是土匪，人民戰爭是流氓運動。」他這套理論，當然遭受中共黨的嚴厲批駁，認爲這是「取消主義」的觀點。

但他堅持已見，竟於民國十七年拒絕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大會。

這次「大會」中，中共對他過去領導的政策加以譴責。當時，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正醞釀組織一個擁護托洛斯基，反對史達林的秘密組織。民國十八年九月回國活動，次年一月在上海舉行反對派(取消派)第一次大會，他與彼等已暗通聲氣。

民國十八年八月，蘇俄在我國決定收復東北的中東鐵路後，派大軍入侵；中共竟然高呼「擁護蘇聯」口號。他曾三度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他的反對意見。

在七月廿八日的一封信，和八月十一日的第三封信中，他指出：中共黨的宣傳太說教式了，

太超羣衆了；那些世界大道理，不能夠解答羣衆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問題。他建議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政策」和「誤國政策」來代替那些脫離中國實際的口號。並且批評李立三採取某些左傾的盲動作法。

他八月五日的第二封信，談的不是中東路問題，而是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革命任務與道路；他要求發揚「黨的民主」。

「中共中央」收到他三封信以後，除予以公開答覆外，並以命令叫他去莫斯科，他不接受，於是，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決議開除他和彭述之、劉仁靜、高語罕、李秉等的中共黨籍。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他聯合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共同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書被中共稱爲「托陳取消派綱領」——攻擊中共黨的路線、方針；並且爲他們被開除出黨，以及托洛斯基被蘇俄驅逐出境鳴冤叫屈，甚至要求恢復托洛斯基的蘇共黨籍和領導職務。

同時，他和彭述之、尹寬、鄭超麟、馬玉夫等正式成立「托派」組織「無產者社」，設中央機構。他任書記；並且出版「無產者」刊物，派汪澤楷到北平建立「無產者北平分社」。

另外，搞托洛斯基派的尚有「我們的話」、「十月社」、「戰鬪社」等組織。在托洛斯基的指示下，合併組成「統一委員會」，自稱「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又稱「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或「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於民國廿年五月在上海設中央機構，選舉陳獨秀、彭述之、王生元、宋逢春等爲委員，陳獨秀爲書記

；發行「火花」刊物。如此，陳獨秀他又成了中國「托派」的「統一」領袖。

可是，大會甫閉幕，若干重要份子即被捕，八月，中央機關也被破壞。「九一八」事變後，他又接受陳銘樞的接濟，企圖活動，頗爲活躍。民國廿一年十月十五日，他和彭述之等也終於被捕了。

民國廿二年四月十五日，江蘇高等法院審判他和彭述之；廿六日宣判，陳獨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爲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陳在獄中研究中國古代語文，並撰短文送「東方雜誌」發表。

蓋棺論定誤入歧途

民國廿六年夏天，政府爲團結軍民，一致抗日，宣布大赦。八月十九日，陳獨秀也獲釋，先往南京，後移武漢，曾在華中大學青年會等處演講，並在「政論」、「民意」等周刊上發表論文。

中共的機關報即攻擊他爲「托匪」，康生甚至於民國廿七年初發表論文，誣指陳獨秀曾經拿過日本津貼，是漢奸。

嗣因戰局變遷，他再遷湖南長沙，最後轉重慶附近的江津定居。

當他在南京和武昌時，思想已有變化。民國廿九年至卅一年間所發表的言論，曾對中共藉抗戰爲名乘機壯大的種種作爲加以批判，他說：

「一切不反對政府的人們，不應該懷疑政府

抗戰的決心……無論政府在抗戰中有何錯誤，甚至根本錯誤，任何人、任何黨都應贊助。」

「中共想利用抗戰機會消滅異己，致使國民黨對共產黨有言行不符的疑慮，所以發生了兩黨磨擦……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的軍事統率權。」

「抗戰已經一年了，農民仍然隔岸觀火。」
「人民抗日游擊隊在戰爭中，在戰後，往往爲社會國家之累，他們是游而不擊，抗日不足，擾民有餘，只能幫助敵人更容易的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擊隊佈滿了農村和城市，甚至避開了敵人勢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

在共黨理論方面，他經過六、七年的深思熟慮，終於覺悟到以下的新見解：

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都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而自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鬪爭七百年，才得到今天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俄國十月革命以來，以「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洞的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實際的民主，才有今天史達林統治的蘇聯。

胡適知道後，指出這是「獨秀自己獨立思想的結論，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

他素患胃腸病，最後四年又有高血壓症，生活清苦不安，營養不良。聽醫生說，用蠶豆花泡水喝，可治高血壓；民國卅一年春天，他常常泡服，雖不見效，但也無損害。

五月十二日泡服已經發醉的蠶豆花半杯，即

感腹脹不適；次日友人過訪，又吃了過量的四季豆燒豬肉，從此發病，醫藥罔效，延至五月廿七日晚九時四十分，不起逝世。

綜觀陳獨秀的一生，最初作爲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提倡民主、科學，提倡新文學；他的思想與活動對於「五四」前後新思潮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也有很多貢獻。

對中共而言，他作爲一個「社會主義」的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初期建設，也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以後他失勢，中共黨人卻檢討他根本不是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他擔任「中共中央」的領導人之後，中共分化、顛覆國民黨的種種作爲，遭受一連串的失敗；等到國民黨毅然清黨、分共，中共卻把一切失敗責任都推到他頭上，說他是「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對他說當然不公平，但在共黨卻是辯證邏輯中當然之事。其實中共當時的失敗，是種種作爲不合社會人民所需要，成爲擾民害民，是力量對比上處於「敵強我弱」的劣勢；即使「黨」不犯錯誤，也不可能就在當時就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頂多只能減少損失和曲折，失敗仍難避免。

最不值得的是他和托洛斯基扯上關係，搞組織活動，成爲「取消派」的要角，乃竟以「以文字爲叛國之宣傳」罪名，被判處十三年有期徒刑。雖說民國廿六年出獄後，沒有再搞「托派」組織活動，甚至還拒絕了「托派」份子的請他重出領導，而表示要「各奔前程」，一再申明：「中

國有沒有「托派」，我不知道；但我不是「托派」。並且曾於民國廿八年對「托派」不抗日，專反共的主張，嚴加批評說：「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團體，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但是仍然被中共黨徒批判他，說他「並沒有在任何場合宣佈他正式脫離「托派」，「托派中央」直到他死時也沒有除過他的名，所以，陳獨秀與「托派」的關係是肯定的。」這好像是一塊白布，祇要染上了色彩，再也不能還我清白了。

抗戰期間，雖說他的思想有了轉變，但對他的治學、事業，都爲時已晚了。

總之，以他的聰明才智、奮鬥精神，如果貫徹當初提倡民主、科學、新文化的初衷，從文化學術上多加努力，他的成就未必不如胡適等人；可惜他心性不定，學養不厚，竟然見獵心喜的被馬列毒素思想所麻醉，陷入逆流之中，枉費了他後半生的精力，卻落得被中共開除黨籍，指責其爲「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取消主義」、「托派」等下場，幾乎差不多不名譽的帽子，都讓他戴上一頂，這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誤入歧途的中國人才的悲哀！（全文完）

五專教材
高普考
考試必讀

國父思想

陳嘉猷教授著

本書爲陳嘉猷教授精心傑作，闡揚國父思想真理，以三民主義與國家主義、世界主義、帝國主義、民主主義、極權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作客觀之比較，乃至與共產主義之明確對比；證驗三民主義之優越性，肯定三民主義必能統一中國。剖析共產國際主義的本質、陰謀，並批判共黨之階級鬥爭論、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國際主義，及唯物辯證法等之謬論。對國父所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語，由共產主義五種不同類型中，闡明其立言本意所在，從學理根本上揭穿並消滅共黨邪說，肯定反共必勝，復國必成。全書五十萬言，附特載十五種，附錄三種。將近十三年（六十一一年至七十三年）來之高普考與特考試題，作有系統的綜合彙編共二百十六題。足供參加高普考特考各界人士之研究參考。每冊定價叁佰元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